

周边的朋友人人都知道我的毛病是辨不清方向,找不到路。经常吃亏耽误时间。我知道自己这个缺点很严重,几乎没有改正的可能。因此对这事是很谨慎仔细的,我知道自己非常容易走错路走弯路走冤枉路,所以在这方面我会笨鸟先飞。

在美国的时候,我开过餐馆,经常会有客人要外卖,忙的时候我也要开着车出去送餐。我会在电话里让客人详细告诉我方位地点,地名电话号码,都记在纸上,有的客人很尽心,会告诉我走多少米向左还是向右,再经过多少米就会到达送餐地点。那时候我找路还是挺有心得的。

回到北京,找路的问题却是越加的复杂繁冗了。北京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大,早不是当初只有四九城时候的老黄历,不用说外地人,我这个从小生长在此地的

都不知某个地带上个月是那个样,这个月是不是还那样。正所谓今非昔比日新月异,恐怕目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的城市一样产生着这样魔幻般的巨大变化吧?

北京变化着,我却没有什么变化,我无可救药地依然不识路,这是我身上的绝症,好不了啦!于是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前不久我为准备赴台北演唱的事情,经常需要和钢琴家伴奏。偏偏与我合作很久的钢琴伴奏王女士忽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医生说她的身体不基强壮需要保险。她急匆匆地买了机票回哈尔滨老家去了。事发突然,把我这个歌唱家给撂了!急得我只得转头向我的堂弟、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吴迎求救。

把百忙中的堂弟搬出来为我伴奏,自然我要随他的方便,于是我走出家门打车去他位于陶然亭公园对面的住处,合一次伴奏。

黑猫的唢呐

赵宗仁

黑猫的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唢呐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民间艺人。黑猫原来有个姐姐。上世纪50年代末,农村闹饥荒,每天都是半饥不饱的,黑猫的母亲没有奶水,黑猫姐姐生下没多久就夭折了。到了60年代初,农村的情况有了好转,黑猫降生了。那时农村有一种说法,要想孩子好养,就必须给孩子起个牲畜的名字。于是,“黑猫”就这样叫上了。

为了后继有人,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学吹唢呐。也许天资聪颖,十多岁时,黑猫的吹奏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每当有吹奏的营生,父亲便让黑猫代他出场。渐渐地,他父亲也就退出了这一行当。黑猫比我们小几岁。他小小年纪就能唢呐,所以,对他特别关注。再后来,他和我们知青成了好朋友。

黑猫小学毕业后就回村了。虽然黑猫干农活不行,但他吹唢呐的水平还真不低。我们知青的歌,他只要听几次就会吹了。平地里只要有空闲,他都会练习。碰到晴天,黄昏时分,他会拿着唢呐到后山上去。那声音时而低沉,时而灵动,时而清脆明亮,和着鸟鸣不时地传至山下,好像人间的喜怒哀乐它都能表现出来,让人觉得非常奇妙。当然,真正见识黑猫的艺术还是在村民举办婚嫁娶的仪式上。

那一年,队长的女儿出嫁。当地农村的婚俗很奇特。新娘出门时,双脚不能着地。出门时由舅舅背到门口,站在凳子上,然后由新郎背起,背到停在村口扎满彩带的手扶拖拉机上。那时还流行哭嫁的风俗,所以,婚礼仪式上既要吹欢快的曲子,也要和新娘母亲的哭声吹出悲腔。别看黑猫一帮草台班子,锣鼓敲得有声有色,很有节奏,而唢呐在合奏中更是主角。只见黑猫的手指在唢呐八个孔上不停地移动,气息或重或轻,吹得委婉起伏,荡气回肠。

如果碰上村里举办丧事,这个吹奏班子则更加卖力。那时,村民们都是买一块花布作奠仪。出殡之日,家人、村民送来的所有奠仪花布都要用竹子撑起,每一面“布帐”由一人举起,走在出殡队列的前面。那“布帐”迎风招展,很有气势。再后面便由八人抬着一口棺材,走几步停下,伴着“阿喝喝”的叫声,锣鼓声、鞭炮声齐鸣;随后便是唢呐独奏,吹的则是皖南花鼓戏中的“悲桃”唱腔,曲子行腔缓慢,悲凉忧伤的唢呐声在山谷回荡……

返城30年后,我们几个知青回到了当年的村上。日思夜想的第二故乡已然变了模样。据村民说,改革开放以后,黑猫自己组建了一支演出队,把儿子也送到了县里读书,后来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他自己也在县城里买了商品房,把70多岁的父亲接到了城里。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更何况黑猫遇上了发展经济的好时光。这不,原本干得一手好农活的几个老哥,弯着腰、挽着袖,仍待在村子里,而黑猫则靠着一把唢呐硬是把自己吹进了城。



蓝色威尼斯

(油画)

方世聪

不开车是我的常态,出门一般会叫出租,这次也不例外。谁知赶上了一个和我一样不认路的司机,您说我的运气怎么就这么“好”呢!

这司机三十岁左右年纪,操着一口北京远郊区的口音咬着舌头说:“您毫(好),您赏(上)的介(这)个地缝(方)额(我)不输(熟),额(我)就用介(这)个速(带)路吧!”

我一看,他用的是现在许多人在车上装的定位导航仪。司机说他是刚刚上岗开出租,上路仅仅第四天,来自北京远郊区,对市内繁杂众多的道路一点都不熟悉。但是这导航仪很灵,它能带着车里的一个准确简捷地到达任何一个目的地。

导航仪,确实是个好东西。这是近年来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的驱车必备的仪器。安置在车前玻璃下面,想去任何一个地方,输入地名就可以了。尤其适合从外地来的人。这位司机虽说是个“生瓜蛋子”,但聪明的他却在车中安放了导航仪,因此乘客是可以放心的,于是我当然也就放心了。

我的目的地是堂弟的家,他家位于北京陶然亭公园东门对面的一个叫朱雀门的公寓楼。我想,朱雀门是个新建的公寓楼,当然不如人所尽知的陶然亭公园名气大,于是我对司机说只要开到陶然亭公园东门街对面就行了。这样,司机便在导航仪上设定了“陶然亭公园东门”的指示。

我很放心,司机也放心地将车开动起来。冬季的北京,气候寒冷,人们都穿着厚厚的冬衣上路的,我也不例外,厚重的棉服,高筒的皮靴。进到车里,温度升高,过了一会儿便觉得眼皮发沉,头脑晕晕,困意大增。司机却兴致蛮高地跟我聊天,一面转动方向盘,一面对我说着他刚上路这几天的新鲜事儿,什么一对老夫妇上车以后斗嘴,老头说话慢老太太说话快,最后老太太急了,行车路上就要开门下车去,急得老头说话速度突然快了起来,说你要自杀干吗这时候才自杀,吵了大半辈子,早干什么去了!把我头发都耗白了?这就叫不负责任!

我听他讲的这段糗事倒有意思,一时间的困劲儿倒跑了。睁开了眼睛问他:你这路走得没错儿吧?只听导航仪中说着:前方五十米左拐。只见车子已经开进了一条窄窄的小道,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我去过堂弟家的,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路嘛。

正想着,只见车子按照导航仪所说左拐,拐进了一条更加狭窄的小路,两边是一排排民房,不对!这绝对不是通向陶然亭东门的路,陶然亭公园应该是处在一条宽阔的马路边上,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可是这里,是那种北京典型的未开发的滞后地带。这时听得司机说了声:倒(到)啦!

缘故吧,看起来似乎很低。那种蓝色是从天空的深处渗透出来的,而且是那样富有力量。这个巴黎的勒玛莱老区,古老的建筑物在温和的阳光下熠熠生辉。街边不时地会碰到我们并不认识的人物雕塑,他们寂寞地立在路边,对着陌生的人们孤独地沉思着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明白的往事。两位大约都是外省的法国女中学生也正在街上寻觅着浮日广场和雨果故居,在一座塑像面前向我们打听方向。于是我们快乐地告诉她们,让我们一起寻找吧。两位少女露出了甜美的笑容。在穿过一条幽静的深巷后,浮日广场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几乎欢呼雀跃起来。但是这种快乐稍纵即逝,因为星期一休息,雨果故居没有开放,我们只好怀着极大的遗憾,站在雨果故居厚实的大门前面,往门缝里张望。可是里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雨果是伟大的,他给法国乃

什么?到了?这是什么地方?车子停在了一条十分狭小的土路上,眼前是一个大约两三米宽的陈旧的铁栅栏门,门是紧闭的,四周冷冷清清,连个人影都没有。再看门里面,一片空地,远处好像堆放着一些木头之类的东西。我前后左右张望,这怎么会是陶然亭公园东门嘛!?

又听得导航仪说着:陶然亭公园东门到了,本次导航结束。

我对司机说:得!你我都不认识这地方,给你钱,你走吧。对他彻底失去信心,自己转弯抹角走到了大路上,发现身处于陶然亭公园的西门处,也就是说我离东门是个大调角!

结果是,我买了一张陶然亭公园的门票,从公园里徒步前行了大约半个钟头,走出东门再过马路,才找到朱雀门公寓。到堂弟家时比预定时间整整迟到了二十分钟!

连导航仪都找不着北,其他的就不用苛求了。

1952年我刚创办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就遇到几位出版界老前辈。我小时候读两种儿童杂志,一种是中华书局的《小朋友》,一种是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我遇到的老前辈中就有这两种刊物的老编辑老作者。一位是赵蓝天老先生,他是《小朋友》的美术编辑,在《小朋友》上有他的许多画,他的画有特色,一看就能认出来,封面画也是他画的,署名“蓝天”。他是苏北人,高而瘦,慈眉善目,说话文雅,一派长者风度,碰到同志有心结,他总是好心劝解。还有一位老先生就是《儿童世界》的赵景源。

赵景源任少儿社第一任副经理,整天坐在办公桌旁,身边放着一个算盘,编辑部的书价、稿费等等归他管。他为我们少儿社立了一个大功。少儿社成立时只有靠延安路的一幢老式洋房,几年后在后面大草地上造了一幢办公大楼,这大楼据说就是他赚来的。当时暑假作业归少儿社独家出版,每本定价有个零头可以有出入,正是赵景源决定不放弃零头。暑期作业印数巨大,这一来就赚进了一幢办公楼。我在这楼里工作了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拆掉改建大厦。

我小时候在《儿童世界》上看过赵景源的文章,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人马,对商务印书馆的事很熟悉。他跟我讲过两件事,我一直记着。

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是解放前重要的出版物,它汇粹各类图书,学校图书馆必备,我在广州念小学时,图书馆就有一套。这套书是怎么构想出来的呢?照赵景源的说法,是商务当时有很多书已经销售到饱和点,卖不掉,不再版了。于是领导层就想出个主意,把这些书重新理一下,有用的就分类再印,作为文库出版。结果果然有效。书成了名牌,商务也赚了大钱。我认为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值得参考。到了一定年份,已出版的书完全可以清理一下,把值得继续出版的书汇集起来,再补充些新书分类出版。这样还可以让好书不致被湮没。

还有一件事说明当时出版社如何勾心斗角。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两大出版社,竞争得很厉害。很巧,这两家书局在河南路和福州路相交的拐角处互为邻居,商务在河南路上,中华书局在福州路上,成一L形。更巧的是,商务的另一头有一家文明书局挡着,中华的另一头是一条过道挡着。中华书局于是把文明书局盘了下来,这就堵住了商务向另一头扩展的去路,而商务也把中华书局边上那条过道拿来作为自己后门通福州路的通道,这也就堵住了中华书局向另一头扩展的去路。真是不说不知道,知道以后,我经过那里总爱看看,太有趣了。

“文革”前赵景源前辈调离了少儿社,可是“文革”期间还把他“揪”回来斗过一次。但他虽担任过副经理,也不是当权派,根本斗不出什么名堂。在批斗会上他十分淡定,有问必答,声音响亮,不像是在批斗他。

比我老的老前辈

任溶溶

我小时候读两种儿童杂志,一种是中华书局的《小朋友》,一种是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我遇到的老前辈中就有这两种刊物的老编辑老作者。一位是赵蓝天老先生,他是《小朋友》的美术编辑,在《小朋友》上有他的许多画,他的画有特色,一看就能认出来,封面画也是他画的,署名“蓝天”。他是苏北人,高而瘦,慈眉善目,说话文雅,一派长者风度,碰到同志有心结,他总是好心劝解。还有一位老先生就是《儿童世界》的赵景源。

赵景源任少儿社第一任副经理,整天坐在办公桌旁,身边放着一个算盘,编辑部的书价、稿费等等归他管。他为我们少儿社立了一个大功。少儿社成立时只有靠延安路的一幢老式洋房,几年后在后面大草地上造了一幢办公大楼,这大楼据说就是他赚来的。当时暑假作业归少儿社独家出版,每本定价有个零头可以有出入,正是赵景源决定不放弃零头。暑期作业印数巨大,这一来就赚进了一幢办公楼。我在这楼里工作了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拆掉改建大厦。

我小时候在《儿童世界》上看过赵景源的文章,他是商务印书馆的老人马,对商务印书馆的事很熟悉。他跟我讲过两件事,我一直记着。

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是解放前重要的出版物,它汇粹各类图书,学校图书馆必备,我在广州念小学时,图书馆就有一套。这套书是怎么构想出来的呢?照赵景源的说法,是商务当时有很多书已经销售到饱和点,卖不掉,不再版了。于是领导层就想出个主意,把这些书重新理一下,有用的就分类再印,作为文库出版。结果果然有效。书成了名牌,商务也赚了大钱。我认为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值得参考。到了一定年份,已出版的书完全可以清理一下,把值得继续出版的书汇集起来,再补充些新书分类出版。这样还可以让好书不致被湮没。

还有一件事说明当时出版社如何勾心斗角。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两大出版社,竞争得很厉害。很巧,这两家书局在河南路和福州路相交的拐角处互为邻居,商务在河南路上,中华书局在福州路上,成一L形。更巧的是,商务的另一头有一家文明书局挡着,中华的另一头是一条过道挡着。中华书局于是把文明书局盘了下来,这就堵住了商务向另一头扩展的去路,而商务也把中华书局边上那条过道拿来作为自己后门通福州路的通道,这也就堵住了中华书局向另一头扩展的去路。真是不说不知道,知道以后,我经过那里总爱看看,太有趣了。

“文革”前赵景源前辈调离了少儿社,可是“文革”期间还把他“揪”回来斗过一次。但他虽担任过副经理,也不是当权派,根本斗不出什么名堂。在批斗会上他十分淡定,有问必答,声音响亮,不像是在批斗他。

吴湖帆梅影书屋故居

徐天一

玉闼未雪把梅探,却道梅神谱自邨①。

茅屋围花红碎锦,远山扫黛绿涵潭。小帘低揭锄寒月,巨嶂浓烘作倩庵②。

莫道歌零还舞散,五湖英气叠层岚。

青泥别渚觅花神,惆怅难逢屋里人。

命宿梅枝伴冰纹,相生玉骨与山梅。

荷裳才识红黄面,岭色早腴青绿身。水气淋漓浑湿梦,一峰还抹宋元春。

注:①梅影书屋名取自宋朝宋伯仁《梅花喜神谱》,宋伯仁为河北广平人,今属邯郸。

②吴湖帆号倩庵。

雨果夫人阿黛尔在敞开的窗目前送着丈夫走出家门的身影。她是那样骄傲,那样端庄而美丽。我想象伴随着雨果一生的他的情人朱丽叶与他在长长的骑楼下依依告别的情景,那是怎样的缠绵与哀伤。雨果夫人是一位画家,她和丈夫只维持了十年的婚姻便离他而去,投入了另一位作家的怀抱。他们的婚姻感情正是在迁入这里之后破裂的。

巴黎又在刮风,我在广场上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想抽根烟。我觉得有些疲惫了,我在想的是,当雨果因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火烧圆明园而愤笔疾书,那一天巴黎也是刮着这样大的风吗?虽然他的谴责信并没能挽回那“万园之园”的悲剧命运,但对雨果的情意,我们还是心怀感谢的。

清歌妙舞的巴黎因为你才有了旷世的骄傲。

明日请读一篇《访莫扎特故居》

域外名人故居

雨果故居

瞿 炜

至全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每一个法国人都以他为荣。雨果也是幸运的,巴黎市政府为了保存雨果遗迹,下令广场内所有建筑物外部均不能翻修改造,整个广场保持着原样。巴黎甚至还有一条路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实际上,雨果从1832年迁入这座宽敞的房屋,到1848年由于六月起义事件被迫迁出,他在这里仅仅居住了十六年。但巴黎市政府为了纪念雨果,征收了这座房子,并到处征集有关雨果的遗物,将这里定名为雨果故居博物馆,对公众开放。雨果去世时,人们在巴黎凯旋门为他举行国葬,并移灵于先贤祠,那里的门楣上刻着:“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万民为他的死去而失声痛哭。我伫立在他故居门前的广场上,想象着那情那景,心里怀着别样的感动。

雨果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站在十七世纪的长廊里,我想象着

雨果夫人阿黛尔在敞开的窗目前送着丈夫走出家门的身影。她是那样骄傲,那样端庄而美丽。我想象伴随着雨果一生的他的情人朱丽叶与他在长长的骑楼下依依告别的情景,那是怎样的缠绵与哀伤。雨果夫人是一位画家,她和丈夫只维持了十年的婚姻便离他而去,投入了另一位作家的怀抱。他们的婚姻感情正是在迁入这里之后破裂的。

巴黎又在刮风,我在广场上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想抽根烟。我觉得有些疲惫了,我在想的是,当雨果因为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并火烧圆明园而愤笔疾书,那一天巴黎也是刮着这样大的风吗?虽然他的谴责信并没能挽回那“万园之园”的悲剧命运,但对雨果的情意,我们还是心怀感谢的。

清歌妙舞的巴黎因为你才有了旷世的骄傲。

明日请读一篇《访莫扎特故居》

域外名人故居

